



# 专刊

总第 105 期

2023 年第 7 期

2023 年 11 月 2 日

信息资料 欢迎交换

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

## “深港科技创新再出发 河套跨境园区新机遇” 研讨会

**编者按：**2023 年 8 月 8 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发布，为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高质量、高标准、高水平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的建设。9 月 21 日下午，由社科联主办、马洪基金会承办、综合开发研究院支持的“深港科技创新再出发 河套跨境园区新机遇”研讨会在银湖 CDI 大厦举办。会议邀请了深圳市福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马宏、深港澳科技联盟顾问、深圳市决咨委先行示范区湾区组专家张克科、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粤港澳大湾区研究中心主任袁义才、福田区人大财经委主任张正峰等嘉宾出席，会上嘉宾回顾河套历史，展望园区未来，圆桌会讨论思维碰撞，挖掘深港两地科技创新合作的深化和河套跨境园区发展的新机遇，给与会者带来了丰富的学术体验。这次活动是社会科学界第一时间相应国务院批准的河套深圳园区规划，开展的多维度研讨活动，相信这样的交流和平台对深港合作大局，聚智者思维，拓各界献策，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现将该活动的主要观点进行整理汇编，以飨读者。本刊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马洪基金会立场。

## □主要观点

福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一级巡视员马宏——

# 穿过时间的河流看河套：小支点大推力，小地方大意义

今天很荣幸受邀参加研讨会，这次会议充分展示了马洪基金会智库的敏锐性，在国务院重磅推出《河套规划》后迅速举办这样一个主题会议进行专题研讨，并得到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积极的报名参与，充分表明了大家对河套国家重大战略的关注。

今天的主讲人是张克科先生，他的著作从口述史的角度展开深港合作交流的历史叙述，启发了我也从个人的视角谈谈与河套的渊源。我想到了几个片段：

第一个片段，1994年，香港的文伙泰先生捐资200万成立研究和促进河套地区发展的“深圳特区促进深港经济发展基金会”，我当时在深圳市民政局社团登记管理处工作，受理所有的社团登记。张克科先生找到我，我是在他的口中第一次听到“河套”二字，印象深刻！现在说到河套我就想到“张克科”，把它作为联想记忆捆绑在一起。那个时候讨论深圳河如何治理，深港如何合作，文伙泰先生资助来做这方面研究，并考虑做时尚、做科创，还有其它的考量（张克科先生插话：这件事在书中第26页有记述）。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河套相关话题，也是一个记忆的片段。

第二个片段，今天主办方为马洪基金会，刚才李罗力理事长还笑称马宏和马洪有什么联系，马老是我非常敬仰的大家、前辈，马洪基金会是2011年成立的，李罗力老师担任了马洪基金会首任理事长，当时我任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批准了基金会登记事宜。现在看银湖这个地方确实是智力荟萃之地，这里汇聚了李灏书记和马老共同创办的综合开发研究院、马洪基金会，以及郑

良玉市长牵头创办的软科学基金会等智库，这些智库在深港发展方面都做了大量前瞻性、基础性研究。

第三个片段，2020年10月14日，我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的会场亲耳聆听习总书记的讲话，他讲“规划建设好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特区生日是8月26日，会场包括习总书记座位在内一共826个，我作为1/826第一次听到总书记完整表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当时我心潮澎湃，这是总书记亲自点题、亲自命名的深圳又一个新的国家战略。

第四个片段，2021年9月之后，我从市妇联到了福田区人大工作，到福田就和河套有了更加紧密直接的联系。福田提出的“三大新引擎”，其中之一就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目前已有香港5所知名高校在深圳园区设立了10个创新研发项目，落地了世界五百强研发中心5家、独角兽企业总部及研发中心8家，汇聚海内外院士12名、科研人员3000余名，各项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推进中。

今天在场的很多学者都参与了河套的研究论证工作，我不能班门弄斧，今天上午福田区召开了理论中心组的会议专题学习《河套规划》，讨论落实举措，区委主要领导在会上讲了三句特别精彩的话，我在这里引用一下：国务院《河套规划》对我们已经做的都认可了；想到的、提到的政策都给了；甚至没想到、没想好的也都给了。这个规划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礼物，充满了想象力。作为人大工作者和人大代表，我注意到《河套规划》第28条讲到“在遵循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基本原则前提下，用足用好深圳经济特区立法权，允许深圳立足深圳园区改革创新实践需要，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给了我们最大的想象和行动空间。尽管河套地区是一个小地方，仅3.89平方公里，但小支点却有大推力，小地方却有大意义，只要找准突破口持续努力，一定会有大的变化，实现建设成为世界级科研枢纽的目标，为国家贡献科研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双重成果。

今天非常有幸来这里聆听各位嘉宾的高见，河套之所以能够落地，也是多

年来包括我们所在的智库在内的社会方方面面，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深圳市、福田区历任领导、广大干部群众艰苦努力、日夜奋战的结果，相信河套的明天还需要我们一起共同努力奋斗，在这也恳请大家继续关心支持河套，不断给河套的发展建言献策，贡献智慧和力量！

再次感谢大家，祝愿本次主题研讨会圆满成功！

深港澳科技联盟顾问、深圳市决咨委先行示范区湾区组专家 张克科——

## 分享河套故事：而今迈步从头越

### 新书出版恰逢其时

非常感谢在马洪基金会借综合开放研究院这个地方做关于《深港科技创新口述史》新书出版的专题交流。这本书的副标题是“河套的前世今生与深港合作”，这是自国务院9月5日举办河套规划专题新闻发布会后的一次朋友们的分享活动，也是这本书出版后举行的第三次分享会。第一次是分享会是8月19日在南山图书馆举办的。我是学图书馆学专业的，非常清楚图书馆的社会价值。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存在知识的社会活动以图书记载下来，只要图书馆有收藏就能够永远传承下来。那一次通过南山图书馆，也向全市的市区两级公共图书馆赠送了样书。可以作为深圳的地方文献特藏流通，让更多关注这个主题的读者，通过深圳图书馆城区的网络借阅和流通。第二次分享会是8月26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是香港科技创新界的一个传统的香港电脑节的专场活动。那天邀请了一众香港的老朋友出席，并以四个不同的环节，回顾交流深港之间围绕跨境合作和河套的前世今生。那一天恰好是深圳市建市43周年生日庆典，深圳卫视直新闻栏目在现场做了专访。他们告诉我，国家很快就会公布“河套规划”，这本书的出版恰逢其时，这次活动的素材非常有意义，他们会选择采用专题播出。之后，8月29日，国务院公布了河套规划，香港商报、香港大公报、深圳特区报、南方日报、21世纪经济以及大湾区之声等都陆续密集的做了

采访。今天由马洪基金会举办的第三次分享会意义非同以往，书中提到深港合作、沿河经济带的研究和河套地区的概念源于1990年政协成立以后香港委员的提案。当年正是综合开发研究院成立伊始，李灏书记请来了马洪先生，在综合开发院的平台上，一直持续不断的成为贯穿30多年的核心研究课题。今天在座嘉宾，像李罗力理事长、刘鲁鱼研究员，还有因公务未能出席的唐杰教授、谭刚研究员等，都参与了最早期的研究。

当时的研究报告委托给综合开发研究院，由刘鲁鱼做了“创立深港科技园的研究”，谭刚牵头完成了“深港口岸协同运作的研究”。在那之前我是在深圳图书馆工作，参与综合开发院筹备组成员之一的是市委政研室主任刘文韶，他的太太在图书馆港澳台及特区文献阅览室工作。经介绍，深圳图书馆成为了综合开发院邀请的国内大专家的集聚地，我也在服务的过程中知晓了这个团队和平台。当深圳市政协常委文伙泰先生提案后，政协领导也在考虑由谁来合作和承担这项任务时，我找到了综合开发研究院，开始了跨世纪的合作。

前几天有朋友在做李灏书记传记的专访，看到张鸿义老领导为这本书写的序，也提到了李灏书记的关心和支持。她问我在这个事情中与李灏书记接触的情况。我回忆到，就这件事情我跟李灏书记有过三次近距离的接触。第一次是在政协会议期间，他在会见香港委员时与文伙泰先生就开发东门商区到关注落马洲深圳河治理的交流。第二次是李定副主席带我一起去李灏书记在北京家中汇报工作进展，那时成立了基金会，北京各部委也很支持深圳提出的跨境合作研究方案，需要向国务院领导汇报。李灏书记到深圳之前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他知道我们的来意后，爽快的答应帮我们联络总理办公室主任何春霖副秘书长。李灏书记告诉我们，为深圳河治理一事，他在人大开会时，有一次在休息室，正好李鹏总理和时任驻英大使姜恩柱都在场，他汇报了深圳河水浸的情况，提出来深圳河治理工程一定要启动，不能再等了。深圳河治河为什么会停下来？后来又经历了哪些磋商，大家可以看张鸿义副市长在这本书序言里面说的故事。第三次见李灏书记是在他退休后，大约是2005-2006年期间，我当时在主持深港产学研基地，辅佐吴家玮老校长在负责深港发展研究院的日常工作。一天，

我接到市委办的一个电话，是李灏书记的秘书来找我，说李灏书记想了解一下最近深港合作的动态。我到他办公室，一见面他就说，我还记得你是研究深港合作这一块的，你跟我讲讲这几年的变化怎么样。他非常关心河套这一块的进展和变化。之后，继任的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都亲自过问和非常关注深港合作，其中河套是必须涉及的话题。为此，我也以政协委员、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和先行示范区湾区组专家的名义，多次提供咨询供决策参考。有些发生的故事也在书中慢慢讲出来。

### 河套的前世今生值的回忆

今天我用的题目是“港深合作新机遇”。两边的语境不一样，深圳讲深港合作，香港讲港深合作。吴家玮教授90年代就说过，这里会发生巨大的变化，现在是港深湾区，将来可能会是深港湾区。我在这里标明“港深合作”是希望深圳可以再一次领会港深合作的价值。在国家战略中深圳作为高水平开放的“冲锋舟”，跨越激流险滩驶向彼岸，目标是要过河，在国际舞台上争当中国战队的楷模先锋。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是深圳前行的好邻居伙伴，是构建新格局的借力、助力，试验场、加油站。河套就是练兵的平台载体，练好本领才能往前冲。所以深圳是“过河卒”，港深是大赛场，我就用了“港深”这个词。

这次分享会讲的是河套变迁的故事，刘战国博士说分享可以聚焦在“破局之路”上展开。这本书我个人认为最精彩的是图文并茂。选取的许多照片是我在过程中随时抓拍留下的。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在编辑过程中，对这些图的处理也做出了极大的支持。原来没有这么多图，编辑过程中陆陆续续挖掘出了许多珍贵史料。当时提出三个编辑方案，一是全书黑白配图、二是在书前面做彩图扉页，但都达不到效果。如果随文章配图则全书要用彩印，费用要增加30%左右。最后我们看到的这个版本就是大家一起努力的成果。

这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两篇序画龙点睛，精彩十分。

张鸿义副市长在2022年2月听到这件事情，毫不犹豫的答应为书写序。这篇序作为今年综合开发研究院推河套主题的第一篇文章，大家应该都看到了。

序言中他讲了河套怎么来的，港英当局前面怎么做的，后面怎么做的，整个历史脉络非常清晰。4月份疫情期间他在上海认认真真的写完了。我一边阅读一边也在学习，通篇从史料的运用、时间人物的核对，包括标点符号，非常认真考究，很感动。今天他本来要到现场，但因甲流原因不能出来，在此也向他表达致意和感谢。

序言的另外一篇作者是陈清泉院士。他是香港回归之后我们国家第一位在香港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是智能电池领域的顶级专家。现在还活跃在各个学术论坛，在书中也有对他的介绍。在香港回归之前，他曾任香港工程师学会副会长等职务，1998年深港举办的第一次院士论坛就邀请他来参加了。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深圳早期有一个电动汽车项目，企业家很热心的开着一辆新车来到机关大院，请领导试车。刘应力副秘书长让我立即给陈教授打电话咨询情况。电话打到香港，陈院士说，当前只有加拿大有能力制造电动汽车使用的电池，至于其他地方是否有，他无法确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你要了解是否有自己的实验室，没有实验室支撑的项目通常都不是自主研发的。在这之后又多次在不同场合和陈教授有交集。特别是2016年中国工程院和香港工程科学院的联合课题，北京邀请我参与，又与陈教授多次深入交流，之后他牵头24位院士在2017年写了一封信给习总书记，这封信推动和改变了整个大湾区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地位、价值和目标。在香港回归25周年前夕，我看到很多媒体在采访陈教授，也在微信中和他交流我的书稿情况。编辑小组也一直希望有一位香港嘉宾可以写序，我冒昧的向陈院士提出，喜出望外，他老人家一口应承了。他花了两天的时间阅读后，再进入庆典活动封闭的前一个小时，给我传来了我们看到的书上的这篇序。

其实，编辑小组还讨论过请吴家玮老校长写序，我也认为他是一位非常合适的人选，先后三次向他表达这个意思，他婉言谢绝了。他说书中有他参与的一些活动，他同意我们将他出版过的书中摘选相关的内容纳入正文，这段文字当时想作为代序放在前面，他表示等书出来以后一定推荐。吴家玮校长没有食言，他的推荐写道：提倡国人仔细拜读这一段“鲜为人知的真实历史”。老朋

友邱达根先生是这一届香港立法局创科界的议员。我们从2006年开始就在深港创新圈的平台携手同行，一起经历过风风雨雨，一直倡导“深港科创协同发展终将实现一体化”。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的分量最重的是口述讲出来的里面的每一个人物的故事，是大家的参与，两个序和两个推荐，包括今天来的林炬文、刘战国、马宏主席、李罗力等书中都有涉及，所以，这本书也是集成了大家的智慧。

### 珍贵照片记述三十年来的探索

这几张图选择了我在不同时段分别在深圳一侧和香港一侧眺望的河套、新田和福田保税区、口岸区的照片，展现了1983-2023到四十年的变迁。关于“河套”历史在香港回归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和时间节点：为什么是1983？因为我们在1981年开始讨论，1983年正式确定，1985年正式签协议，确立有三件事情要做：一是广深高速公路建设；二是皇岗口岸要开放，要架桥，架桥以后治河工程就提出来了；三是大梅沙沙头角一线增设临海的梅沙口岸。这里记录有深圳河没有改造之前的示意图，配合了几张改造之后的实况照。百年以来新界地区一直被忽视的，从租界到经济特区，以及沿河经济带的发展。我讲几个时间点，1991-1996民间研究、1998粤港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议题、2008深港双边共同研究公开咨询、2009年深港边界地区整体发展研究、2015香港经济发展咨询会河套专责小组、2017年深港双边协议、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2020年习主席：建设好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其中，1991年，中央同意按照新修的河道为管理线，将土地归属确权为深圳，并重新开始讨论相关事宜。1998年，第二次粤港联席会议上将此列为正式议题。随后，在1998年香港回归之后，2003年李嘉诚向北京去反映情况，中央开始重视，并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建议。到2008年，曾荫权将河套项目列为了港深跨境十大建设项目之一，并进行了公众咨询，在这个过程中，确定了河套在科技、教育、文创等领域的发展方向和计划。记得在2008年，我和香港工业署的何宣威在一起论坛活动中，他表示河套合作项目晚了10年，如果在当时就起步实施就好了。2017年是一个重大转折。深港从大局大势和未来



发展的立场，妥善一揽子解决了深圳和治理过程中客观形成的历史问题，划入各方的土地以管理线为界确权，河套交由香港政府开发。两地非常友好的协商了相互支持，融合发展的大方向，香港这块仍然叫港深创新与科技园，同时支持深圳一侧划三平方公里的土地，香港支持深圳向中央争取新政策。

其实这块地方不叫“河套”，当时更多的是讲深圳河沿河经济带。在治理深圳河过程中当时就用一个很长的名字在描述，这句话非常绕口：深圳河皇岗-落马洲段裁湾取直后一平方千米南移土地。那个时候真的不知道河套是什么，大多用这个表述：“利用深圳河裁弯曲之后，落马洲一段有一平方公里南移的土地，重新划定管理线之后就可以开展多项合作，如与福田保税区配合，建立合作的高科技园区等”。这个项目就是从91年开始，由刘鲁鱼做的第一个研究，我手上还有这份研究报告。后来为了这个事我就查字典，河套到底是专有名词还是地理名词？专有名词是不能随意使用的，就像张三不能叫李四一样，但是地理名词就可以，后来发现可以用，就凝聚成“河套”两个字，在95-96年，这个地域在我们的研究报告交流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多，开始使用“皇岗-落马洲河套”，约定成俗。刚才马宏主任提到，2020年10月习总书记在深圳40周年大会上提出，要建设好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我非常激动。那次大会上我还记忆犹新的一句是，总书记在总结深圳改革开放十条经验里，第九条是港深“融合发展、相互促进”。我终于看到了“融合”两个字。在过去的30年里面我在不同场合讲深港融合，总有人提醒我，克科注意，不要说融合。

深港能够讲融合，能够聚焦“河套”这个点，浸润化开，像水墨画一样化开，这是一个大幸。实际上，深港之间有七个口岸，从口岸的规划来说，2009年就预测过，深圳与香港之间的口岸规划是超前的，在口岸的容量上面是完全超过口岸性质需求的，因为口岸是国家对外以护照作为出入境的外交权益的管理和象征，但在深圳香港的口岸通道上大约三分之二是在深港出入口通行在大湾区工作的往返人群。特别是每日通勤的深港两地工作的人。我们非常希望深圳和香港两个城市之间，在国家的口岸之外有邻居和家园的便利通道，这是我们80年代以来关注两地合作，特别是香港回归之后一直在呼吁的重要话题，

特别希望的河套这个接壤的工作区可以设计新规则。

## 那年那月那些事

经过这30年下来，深港接壤地区形成了点、线、面的布局，也形成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过程，给我们画了一张很好的、美妙的图。点-线-面：已建成的口岸通关互动结点、深圳河沿河沿线一河两岸布局层面、纵深周边包括香港新界北及深圳福田、罗湖、盐田等接壤城区和轨道衔接的龙华、光明等全域面上的发展规划。这张图是香港做的2030的规划，新界的这一片是三大主轴之一。

2021年林郑月娥提出来了“双城三圈”和“北部都会区”，我个人认为“北部都会区”是香港政府对新界整体未来发展的补偿，而“双城三圈”是香港向深圳抛出的橄榄枝。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重视双城商圈，但它不是简单的圈的问题，它涉及到了经济、基建、创客、民生和生态环境的紧密合作。香港在边境地方不发展，中间反反复复就三个大的点：一是生态问题，二是偷渡问题，三是走私问题。深圳与香港都面临2035年及2047-2050年的新机遇、新蓝图的新挑战。河套在这个节点上发力，意义非凡。我喜欢用轴承组合的传动装置形态来表达我们的区域合作和各环节的价值。深港澳三家在新格局的双循环中，是国内循环、国外循环的咬合面、传动轮，一定要咬合，要变成一体，否则就是套圈一样的玩游戏、玩杂技、耍把戏，咱们不能耍把戏，咱们要做工程，要有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持之以恒。

书中详细的介绍了从91年-2021年，围绕河套发展及深港科技创新合作与实践许多重大实践和故事，以图文、史料、讲述和文献专栏的形式，全景式的描述了许多台前幕后的故事。

如：港深跨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项目。那是1998年10月份粤港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讨论的6个议题之一，结局是其中2个议题搁置了，一个是香港在广州建立商务中心，有点像代表处一样，因为香港在全球二十几个国家都有商务代表处，像大使馆一样；另一个是以河套为载体的跨境科技园，结果因为某些原因搁置下来了，后来的金融风暴也带来了一些影响，这个事件在1998年之

后就停止了进展。

如，2000年出版的《深圳-香港：一河两岸合作与发展研究》。为了对1991-1996年的研究报告有一个历史的交代，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在2000年出版了叫做《深圳-香港：一河两岸合作与发展研究》一本书。这是列入科技部主编的区域可持续发展丛书。在1992-1996年，联合国动议并通过了千禧计划，中国也参与签署了“21世纪议程”。深圳河两岸都是拉姆萨尔公约的保护区，很多人认为深圳的发展对生态环境有破坏性，我们在科技部专家的指导下，一开始就将深港合作的远景定位在可持续发展。从1996年开始就把河套的发展放到21世纪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协同发展的范围内跟香港沟通、交流、研究和协商，经济、科技、社会、环境等都是考虑的因素，并得到国际层面的支持。现在，这个全球面向21世纪的愿景进入到2030可持续发展国别议程，深圳是国家批准的特大城市示范之一，在先行示范区的规划中，也提出要做中国城市楷模。这里我还是觉得20多年下来，我们的愿景方向是清晰的。

高尚全先生为那本书写了序。他是国家级智库的大顾问，也是马洪基金会最早的导师。他认为：“深圳河两岸地区是‘一国两制’地域连接最近的地方，这个地区的衔接是深港衔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珠江三角洲-深圳-香港的交汇处，也是深港乃至香港和珠江三角洲大经济合作之陆路交通运输和旅客出入的必经之路，香港与内地跨界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接口大多分布在这一地带。这是两地社会经济衔接的枢纽地带，具有特殊的地缘优势。两地如能很好的配合发展，将会成为互利互惠互补和共同促进的新经济增长带。这是一个非常美好，又特别实际的设想，任何一个没有偏见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都会为之呼吁”。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主任 刘鲁鱼——

## 深港双城记：一直在路上的故事

很高兴在从事了河套研究30年之后，终于看到当年的构想正式实现了，我

的心情是又喜又伤感：喜的是当时研究院提出这个构想已经完全落实了，中央正式批复了。伤感的是这本书的出版代表着我也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了，当时我是研究院最年轻的研究人员，我研究生刚刚毕业，主持的头一项研究就是这个研究。

还有一点很感动，张克科同志是我的老朋友，我在深圳认识第一个比较好的朋友就是他。当年他还在图书馆时，我们就有比较多交流，因为我当时负责信息部，需要去图书馆进行一些协作工作，然后就认识了张克科，他是学图书馆学的，后来他去了政协，把河套合作这件事情就交到研究院来，我们正式成立了一个课题组。当时这个课题组一开始只有我一个人，后来把谭刚调来了，就成立了两个人的课题组，这件事情已经过去30年了，很多的原始资料都没有了。但是我很感动的是，张克科同志一直对这件事情咬住不放30年，而且他把我们当年所有的文字资料，包括马老、林老形成的论证意见全部保存下来，一张纸都不差，这些文件我们现在根本找不到，所以学图书馆学的人还是很了不起。

因为我搞研究搞了一辈子，现在已经退休了，我有一个很好的习惯是保存资料，到处都是我的柜子，尤其是当时马老、林老，这些过世的老前辈留下来的珍贵意见在张克科那儿都有，将来等到后人要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这当中的史料是丰富的。

1992年张克科突然找到我，那个时候他在政协，说有一个政协提案——第5号提案，主要的核心意见是深港合作，借助深圳皇岗口岸和福田保税区的开发带动香港的开发。因为文伙泰他有双重身份，他一方面是深圳市的政协委员，同时他也是香港新界的议员，他就是对面新田村的人，那个时候很多的土地都属于文氏家族，因为港英政府把香港掠走以后，长期实施的是背离本土发展的战略，注重发展港岛、九龙，但是不发展新界，所以新界现在大部分还是农村，这是它殖民政策造成的后果。当时文伙泰比较着急，从港人的角度提出深港双方应该携起手来共同发展边界地带。

张克科找到我，带我去见了李定，当时李定是政协副主席，李定非常重视这个提案，我们一起商量，然后承接了这个课题，由我担任课题组长，我们一起展开讨论。文伙泰是从家乡的发展出发，尤其是房地产的发展，因为新界主要都是农地，发展不了，如果没有法律的松动它变不了现，同时他所提的这个地方又在香港，当时没有回归，我们和政府层面很难沟通。所以我们就认为不能完全沿用边界地带，应该用更大的概念，我们把这个构想放进去。当时我和谭刚想了半天，结合福田保税区的开发，我们就提出了一个概念叫“深港双边合作保税区”。为什么要这么提呢？当时有一个基础，我和谭刚参与了福田保税区最早方案的撰写。保税区有个免检的一号通道，是从香港直接下去，它有这个便利条件存在。当时深圳河正在进行裁弯取直，其实最早河套的形成不是我们主观的要求，而是香港的要求，因为香港像黄河大转弯的地区一样每年都有内涝，每年大雨一到罗湖地区就洪水泛滥，所以裁弯取直之后在建设当中就可以解决水患问题。

所以我们当时就采用了双边合作保税区的说法，它有一个核心是依靠福田保税区本身，同时我们还提出在两岸边界各自打造一个配套发展区，香港定在新田，我们定在河套。到了92年中，主报告形成了，当时我觉得好像还是有点意犹未尽，因为我们一时找不到抓手没法操作，于是我就自己写了两个分报告。一是“开通皇岗落马洲穿梭巴士报告”，当时港英政府有一个政策很讨厌，它有一个500米的边境禁区不准人走，只能通车，我们皇岗口岸只能车辆通过，人员的来往交流没办法实现，人如果不能通行，双边合作也就不能保障。这个方案很顺利地通过了，97年正式实施。同时我还写了另外一个分报告“创立深港科技园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头一次提出在河套地区创立深港科技园，作为双边合作保税区的配套发展区，这个时候是92年年底。

所有的报告形成之后还有面临着如何推动的问题，因为当时我负责跑北京线，每个月要见马洪理事长。我当时负责组织香港、台湾一些外地学者过来的交流，包括资料的传递，还负责当时马老主办的《中国改革》的英文版杂志的出版。那是在香港，所以我每个月都要去拿稿子听马老的意见，和马老汇报一

些事。没想到这套方案在马老那儿引起极其强烈的反应，我当时是当作一般的课题开展研究，马老一直在追问这件事情，后来他认识到这个方案的重要性之后，就找了李伯喜、高尚权（音），把改革开放这些元老都找来，让这些人加入当中一起来推动这件事情。

我后来和林老谈过这件事情，我说为什么马老对双边合作保税区尤其是河套非常感兴趣，林老说很简单，当时我们面临西方的制裁，就是巴黎统筹委员会，就像现在美国制裁我们一样，当时有一个“巴统”，所有的进出口都要经过巴统的审查。河套地区正好可以满足我们绕开巴统的需要，这个裁弯取直所形成的一平方公里土地它是适用香港法律的，但是使用权属于深圳，也就是说它理论上属于香港法律管辖，而实际使用权属于深圳。所以这一条定律现在还存在，尽管巴统没有了，还有美统、日统、韩统，我们河套的价值也在这儿，它是非常特殊的桥头堡。

接下来谈谈河套进一步开发可能面临的问题和我的一些构想。河套的开发困难重重，香港不管政府换了多少届，它的既得利益集团都不希望河套被开发，尤其是地产商。随着河套概念的提出，当时我们深圳和香港包括北京和香港一直在沟通两件事情，一是河套的利用，二是上水到落马洲的侧接线，那13公里的铁路，就这件事情拖了差不多20年，可想而知香港方面多么消极。尽管现在香港政府换了，我们《国安法》颁布了，但是它的利益集团，它大的地产商仍然存在，要开发它仍然很困难，无异于与虎谋皮。

2015年左右，当时我还在人大当计划预算委的委员，我当时推动了一件事情，让深圳人大计划预算委出面，和香港政府联系，安排我们过去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香港的署长、副署长所有人全部出马，规格非常高，带我们看了一大圈。中午请我们吃饭说了一句，这儿没法弄了，因为它已经颁布了法律，米浦属于自然保护区。香港政府现在启动了新的新界计划，是保护计划，它把新界的4大家族的土地都划为保护区，你可以发展农业、旅游、景观等等，唯独不能发展产业的内容。

所以下一步我们要推动河套开发，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一定要避免房地产的色彩过于浓厚，因为所有的人盯住这个地方，许多人的大动机是房地产，是土地的升值。但是在这里开发房地产会非常困难，几乎不可实现，所以一定要把这儿做虚，不能做实，做实会和太多的利益集团发生冲撞。说实话深圳已经没有太多利益，沿岸全部开发了，甚至二次、三次开发，有的人甚至提出把福田保税区的围网拆掉，规划在疫情前就出了，因为我参与过那个规划。要尽可能的利用河套的概念、政策，利用香港的法律，这是对我们智慧的考验，我认为在这方面可以作为一个公共课题，秘书长来进行推动，发挥智库的智力资源。最早河套这个概念是我们提出来的，它的价值不在于土地本身，土地再有价值也仅仅是一平方公里，那才多少，前海都有28.2平方公里。

第二，这一平方公里以金融、法律服务为主，一定不要偏离方向，但是它的服务对象是科技，可以把它作为前海的延伸。因为我们5年前就启动了前海周边地区开发，当时那个方案是我做的，70平方公里，一直可以辐射到光明，包括我编的产业目录国家计委和统计局在两年前就批复了，未来产业、最新的产业概念放在这儿。我说的核心的意思是这个地方应该变成深圳的百慕大，我们把有价值的公司，尤其是科技创新公司的账本放在这儿，把它变成融资的中心、避税的中心、信息自由交流的中心，还有关键设备的租赁和展示中心。比如说光刻机不能进来，我以金融租赁的方式行吧，一平方公里足够了。未来光刻机的技术难题我们攻克了，可能还有别的机，我们不可能百分百地解决高新技术的所有核心问题。

在这一点上香港的其他因素并不重要，反而是香港法律，我个人的判断比较悲观，深圳毗邻香港，从建立特区那天起香港像个恶梦一样萦绕在我们周边。深圳不仅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反而找了一大堆麻烦，所以下一步的合作前景我并不乐观。

在这个方案之后我从事的和深港合作比较关系重大的课题有两个，一个是

把账本放上去，这是最重要的，把上市公司和准备上市的科创公司的账本放上去，把香港的金融服务引进来。这件事情不能空穴来风，我2013年做完深港合作区的规划，3年以后许勤书记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评估一下需要多少年才能达到当时的规划指标，我经过测算告诉许书记，我说4大产业已经有3个产业超过香港了，唯一一个金融产业在理论上也是超过它的，因为我们人均的劳动生产率是高于香港，换句话说现在金融也超过了它，所以香港不是我们对标的方向。但是我后来又做了香港自贸区的规划，我提出来两个想法，第一是信息自由港，在这28.2平方公里把网关打开，当时被许书记骂了一顿，说国家安全问题不能提。第二，我提出在前海的中线结合招商旅游邮轮母港的建设，打造一个金融岛，建设深圳的百慕大。

香港深圳专业界别协会秘书长 林炬文——

## 港深联动，河套才有所为

谢谢各位，我谈谈自己的体会。我85年大学毕业来深圳，后来去了香港工作，曾经在市统战部港澳处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就认识在市政协工作的张克科先生。刚才看到的这本书可能会让大家有疑惑，为什么这个地方河套地区首先为什么从一个香港委员口中首先提出来，然后上升到市委市政府那么多领导，那么多部门去研究它，推动了30年，直到现在还在研究。我和大家讲讲我知道的背景和我的体会。

深圳的发展与香港的因素。大家知道80~90年代，香港对深圳的发展影响力很大，当时我们生活在深圳，都感受到香港经济的影响，当时中华自行车、康佳电视，陆氏电子等等，叫得出名字的都是香港的知名企业，也就是说香港的经济对我们深圳当初的发展起到很大的影响且密不可分。1990年市政协成立，有一批香港知名人士包括文伙泰先生获推荐任市政协委员，香港委员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受到市委市政府各级领导的重视、关注。我记得我在统战部港澳处工作的时候，每年政协两会当天晚上由市四套班子领导在银湖宴请香港委员，



听听他们的意见，在某种意义上加以重视。当时香港的因素对深圳的影响力很大，香港委员提出来的方案会受到各界领导的重视，也就顺理成章，张克科先生在政协港澳委就负责这个工作。

第二，后来我到了香港工作，搞一些群众基层社团的工作，主要是负责选举。为什么负责选举？因为香港是实行“一国两制”，政府施政、拨款都需经过“立法会”需占多数的议员通过，政府才可以做，在回归后香港的立法会议员大多数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每一位议员手中都有否决政府议案的权利。刚才大家听到，我们这边各级领导都对河套开发很有热情，但去到香港与香港接触就被泼了冷水，包括各个政府部门。在香港，是每个立项、每项拨款都要经过香港立法会，立法会的运作机制是三分之二议员通过的议案政府才可以做，也就是说河套区真的要发展，还是需要经过香港立法会的多数同意政府才可以做。过去，香港的立法会多数之中，我们的建制派没有达到三分之二的比例，所以有很多深港合作、深港发展、两地融合的提案、议案，都没办法在立法会通过，无论政府官员多卖力宣讲，他就是不举手，那也没办法，就无计可施。我们几任特首董健华、林郑月娥等，对我们深港合作本意很积极，但是受限制于体制就是难以推进。1993年开始谈河套区，为什么现在还在谈，还在规划，立法会就是这个其中很重要的困扰因素。香港立法会，包括跨境的基建它都不予通过。港珠澳大桥也谈了20年，1983年胡应湘先生提出来建这个桥，2018年才建成通车。我们西部通道也是提了很多年，到了2007年通过。也就是说尽管河套区的概念很美好，也对两地的融合非常有利，但是一直通过不了，关键就在于就是这个因素。以上就是困扰深港合作的“制度”因素，当然也包括过往香港人对内地的偏见，在政府官员、民间都存在抗拒两地紧密合作的势力。所以刚才李老师说他不乐观，我也不是很乐观。但是也有乐观的一面，现在新的立法会基本上建制派占了很大比例，我相信只要有利于两地融合的一些提案或者方案，我相信立法会能够过得了，就会顺很多，比较顺畅地推行。展望未来，河套将迎来大发展。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产业发展中心主任 刘战国——

## 读《河套的前世今生与深港合作——深港科技创新口述史》有感

谢谢各位，张克科主席是我在深港产学研基地时候的老领导，2006年深港产学研基地成立了深港发展研究院，我是最初在那里工作的人员之一。那时我主要从事两方面的研究，一方面是深港合作方面的研究，包括河套地区一系列的研究，另一方面是科技创新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着深圳市和南山区的科技创新展开。

这本书主要讲深港科技创新合作，河套只是深港科技创新合作的一部分内容，除了河套之外，还有一部分内容是深港在其他方面的科技合作。粗略看，从上世纪80年代末一直到2000年左右，围绕着河套的各种创新、各项举措基本上到达了一个高点。从2000年开始张克科主席本人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深圳高新区的建设上，包括联合北大、港科大组建了深港产学研基地，参与了深圳高交会的相关工作，推动深圳高新区和香港科技园的合作，开通深港穿梭巴士，以及牵头推动深圳IC基地建设等等。这些内容在书中也都有非常精彩的体现，尤其是讲到当时深港如何在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中进行合作的。

2010年后我本人也把研究的重心放到科技创新和区域产业发展方面，很少参与河套深港合作方面的研究。因为感觉那个时期深港的很多合作已经推不动了，从深港创新圈建设开始就逐渐冷下来了。深圳有深圳的热度，深圳做科技创新，香港有香港的热度，做金融和旅游。深港分成两条路线发展了，我也就很少参与深港合作方面的工作。

回到今天这本书，因为我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张克科主席手下工作，读这本书的时候会引起很多回忆。我加入深港产学研基地的时候，张克科主席围绕着河套的相关工作已经到了尾声，工作重点聚焦到了深圳科技创新发展。但是，我还是有幸和他一起参与了河套的部分工作，包括和文伙泰先生交流，去整个

深港边界区调研等等。当时我还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学生，很多事情是懵懵懂懂，但是他会假设我已经完全了解情况，在交流中满口都是各种专有名词，事实上很多背景我当时完全不了解，只能硬着头皮听，跟着他摸索着做研究。在阅读本书的时候，我才发现他曾经提的事情背后的诸多故事，感觉就像把以前的记忆全打通了，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

从研究的层面看，读这本书就像是经历了“河套破局之旅”。为什么用“破局”两个字？是因为河套从上世纪80年代谋划一直到现在用了40年的时间才最终取得突破。河套这一平方公里，堪称是“最复杂的一平方公里”，体制、海关、产权等诸多问题犬牙交错。

仔细算来，从1998年河套问题被搁置，到2017年深港就河套土地问题达成一揽子协议，经历了大约20年的时间。如今深港科技合作的很多设想，在20多年前的方案中都已经提出来了，比如在深港边界建立“深港高新区”，在福田建立保税区建立“科技服务大厦”等等。如今河套规划呈现的内容可以说是20多年前的升级版。

而河套最终取得突破，也是得益于一种“办法总比困难多”创新精神，勇于突破打破常规，找到“摸着石头过河的石头”，这在2000年后深港科技合作中其他方面体现的尤为淋漓尽致。

对于深港合作的未来，刚才各位老师都提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的发布意义重大，尤其是对于河套发展。我个人的感受是目前平台已经搭建好了，下一步的工作是大家一起给河套出难题，把所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扔给它，因为国家把政策创新的闸门打开了，河套就要负责去突破，这相当于又一次的改革开放。

河套未来发展成什么模样，现在都说不准，但是我们有什么难题是很确定的。河套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里的“东风”就是“出题者”，河套能走多远完全取决于其依托政策优势打造的破题能力。

以上就是我读这本书的感受，谢谢。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公共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 汪云兴——

## 建设好河套这一国际化科创平台

非常感谢主办方的邀请，刚才刘战国讲他是张克科先生的学生，其实我想说，在这个话题上面我们想一直做学生，向今天到场和未到场各位领导、专家还有各位同行、CDI的同事学习。刚才大家都提到这个地方未来发展的重重挑战，但是规划已经公布，希望就在前往。我希望我们要把这项难而正确的伟大事业往前推进。

在这里我想回顾两个时间点：

第一个时间点是6年前，我们综合开发研究院参与，联合有关单位成立了一个研究团队，刚好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密集调研的时候，那个时候关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发展已经有了一些眉目。大概是在2017年9月份的时候，市领导交代发改委立即成立一个写作班子，我们于10月份到福田发改局会议室前前后后封闭了一个月，写了第一份深圳版的河套科技创新规划，2018年6月份深圳版的原则审议通过实施，后来这几年也基本按照规划的思路持续推动一系列重大项目、政策落地实施。应该说，这个规划编制还挺难的，那到底难在哪？刚才有领导说到总书记在深圳建立特区40周年庆祝大会上点题了，其实我们当时特别纠结，叫港深科技创新园、深港科技创新园、特别合作区、又或者是深圳园区，各种名称的组合排布。最终深圳的文件叫“深港科技创新特别合作区发展规划”，就是这个名字，突出了“特别”“科技”等关键词。从2018年6月份颁布之后，我们还推进了另外一件事情，2019年2月份颁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就明确了这件事情，我们把这个规划往上推，相当于深圳配合国家部委研究编制规划。后面3年因为其它因素，包括其它3个平台也都一样，规划和实施意见都比较晚，我们是最后一个发布的。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深港的合作、科技创新的合作，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的科技协同创新、对外开放合作是非常难的事情。

第二个时间点是6天前，我去发改委支撑一些工作，因为规划发布了，深圳要出台具体的落地方案，我们得准备一些材料，包括行动计划、政策清单、项目清单等等各种事情。在研究过程中，大家一致认为要创新思维、开拓视野，河套是深港的河套，大湾区的河套，全球的河套，国际化的河套，避免出现深圳的河套、福田的河套概念，它不是深圳的河套，也不是福田的河套，一定是国际化的。

在总规里面有一句话写的特别好，协同香港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这一中心任务，汇聚全球资源。从这两个时间点中，我自己有深刻的感受，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现在叫深方园区规划，仅就从深方园区规划这一件事情来讲，它已经是非常难的事情，那未来随着香港园区的有关发展逐步推进，会更难。在此，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年轻的研究人员、给我们综合开发研究院更多指导，希望我们能够一直成为各位前辈的学生，我们一同坚持把这个“难而正确的事情”向前推进，谢谢大家。

深港澳科技联盟顾问、深圳市决咨委先行示范区湾区组专家张克科——

## 借力香港 服务香港 河套大有可为

刚才正峰主任讲了两个案例故事，由此提出两个特别有意思的建议，一个香港要进入内地，一个深圳要走向国际。这两个建议的核心就是要继续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香港面对深圳的开放，通过窗口、桥樑、通道，四十五年下来，经历涵盖了三来一补、商贸合作、金融物流等等各个方面，特别是CEPA的实施和一带一路的链接，对于深圳来说，通过香港走向海外，坚持对外开放的地缘、机缘和人脉优势非常重要。香港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香港的作用在于带领我们熟悉规则、读懂市场、走向国际新赛场。我们必须走出去，只有在海外的历练中才能形成真正的全球化格局，实现高品质的双循环发展，也才更能体现深圳站位先行示范区的价值。因此，希望大家能够看到香港的

价值，看到深港融合的站位，充分借力香港的平台，登上船只、扬起帆篷、乘风破浪，向海外进发。

这一次国家颁布的河套规划，明确提出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同香港共建国际科创中心。香港在三年前就布局投资了200亿做了科创旗舰项目 innoHK。第一批人工智能和生物医药领域的28个研发中心已经集结，计划在3-5年内引进全球最好的专家、最好的团队，达成一批产业科技创新的成果、培育一批高水平团队，打通科研成果通往市场产品的产业化新路径。我想，这个投资的研发项目完成后，一定需要和内地尽早实现产业对接，这也是深港毗邻空间布局优势资源，并在产业和科技领域建立更好的融合平台，以更好的发挥社会效益的新机遇。以往香港的平台主要是引进外国的产品带到国内加工、进出口和进行贸易，现在更应该是引进国际人才和团队在香港进行孵化，在0+1的过程中推进发展。河套规划定位要作为产业化的中试平台，将有更大的发挥空间，目前，香港政府正在加大力度做河套香港园区的第一期，首批三栋研发空间约10万平方米。上周，在河套深圳一侧的福田也开放设立了2万平方米的香港科技园独立的平台，还有12000平方米的港深共同培育新项目的空间。

在这磨合期出现两个问题，第一，香港引入和开放了一批公共实验室平台，希望港深两地的团队可以一起开展合作研究，但由于跨境要素还存在一些障碍，香港的许多资源还不能顺畅的到深圳，深圳也担心到那里去的后续风险，不敢去。因此，希望深圳更多的实验室能够在香港的平台上面提供公共服务。第二，深圳很多企业进军香港，但是香港现在缺少土地和空间，注册到香港要落地在深圳园区，没有清晰的政策引导，还是属于深圳企业，享受不到香港的国际化资源的全覆盖服务。从时间看，香港已经完善了快捷服务和咨询服务，香港的法律、税收、人才各方面都可以为深圳的平台服务。

现在亟需在过渡期对分别在双方注册需要的异地过渡的企业采取的新规划。昨天在其它会议上，深圳也有学者提出来用“双总部”的方式，内地的企业注册成香港公司，但总部不一定要设在香港，因为河套尚未形成气候，可以在福田保税区里面的香港科技园设立办公室，以便香港的企业进入内地，同时，

也希望能够不注册内地的公司，但能够进行业务活动，以便保持国际化的方式，特别是海外大公司能够在这一个平台来实现更好的合作。这也是我一直倡导的，要建设“湾区驿站”的模式。

我们希望能够开放，就像前面有专家提到通过典型项目试验的方式把政策落地，将各个环节有机的连接起来，形成以河套连接深圳、连接国际以及国家发展的桥梁。香港法治依然是最好的法治，而且拥有更广阔的人才发展空间，我们希望向全球征集人才，共同打造河套，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繁荣发展。深港携手同行，河套未来可期，大有作为。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谢来风——

## 强化协同联动，打造世界级科研枢纽

感谢社科联和马洪基金会组织的研讨会，河套发布之后我们参与很多研讨，今天收获颇多。

第一，首先祝贺张克科老师的新书发布，非常高兴，我记得大概是两年前在市里面开会遇见您，您说正在进行《深港科技创新口述史》的撰写工作，我当时听到非常期待，因为深港合作或者科技创新合作的研究工作有些碎片化，对这段历史脉络的梳理工作并不多。虽然深港两座城市不断的在发生合作，不断的在发生变化，但是这方面的书，特别是口述把故事展现出来，毕竟还没有，首先祝贺张克科老师的书发布。

第二，我在2017年加入研究院，机缘巧合，进来之后第一个课题就是研究深港合作，也是关于河套开发的，由市港澳办委托的课题。当时还叫做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还没有总书记的相关讲话。一开始有很多称呼，比如深港科技创新，或者特别合作区，后来又叫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2017年课题研究重点的是合作区的定位和政策。在2021年，市决咨委让我们研究体制机制的问题，当时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建立深港理事会，并将这一建议写到总体规划当中。

去年已将此方案上报给国家部委，并进入和部委反复沟通修改的环节，同时，我们也做了政策的一些修编，还有一些政策点的论证过程，这个过程比较漫长，因为规划涉及到很多部委，福田区领导带领我们开了很多次会，逐条修改里面的内容，很辛苦。另外我们院很多团队都参与了里面的规划。

2022年从和国家部委沟通修改规划的过程，明显感受到国家层面的期望，河套不只是深圳的河套，深圳不能只考虑依托河套做自己的事情，而是要把香港纳入进来，要在规划中体现香港元素。汪云兴所长他们在17、18年已经做了很详细的规划，当时交给国家部委，国家部委在反馈意见中提到，里面考虑香港的元素不够多，需要再修改完善。于是2019年之后又开始重新进入新一轮的研究，我们是做港澳研究的，因此加入到规划的研究和修编。

河套虽然小，但是对于香港的发展，对于“一国两制”新实践，对于大湾区的建设，都意义重大。特别是这两年全球科技竞争愈发激烈背景下，国家又重新考虑河套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个人从2017年进入到河套研究，每年都在研究河套问题，能够感觉到整个河套的定位，所要承担的使命和整个国家、国际形势紧密相关的，这是我个人从事河套研究的感悟。

今天圆桌的主题之一是对河套未来的思考，我也简单从研究者角度讲一下自己的思考。首先，河套很重要的地方在于“区域协同”的问题，其它的平台，包括横琴、前海、南沙的方案，主要讲自己如何把这个平台做好。但是河套不太一样，河套除了做好自己，很重要一点是要考虑如何与其它平台联动发展。包括方案里面提到的和香港园区、光明科学城如何协同联动。前几天省发改也找我讨论，如何从全省的角度去看几大平台之间的协同联动？如何发挥好河套的支点的作用？

河套的中心任务是协同香港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这是它最核心的任务，如何跟其它平台联动起来，这是未来需要重点研究的地方。香港园区0.87平方公里，但是现在规划了新田科技城，还有北部都会区，未来香港的发展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就像刚才袁主任讲的，香港这几年的变



化很大，包括政府行政的思维逻辑，香港也在进行土地条例的修改，香港也在进行改革，改革不是内地的专有名词，全世界都在根据新的形势改革，香港也在改革。

第二是河套在国家创新体系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上半年在香港进行了很多调研，能够明显感觉到美国对内地的制裁也在影响香港的企业。刚才很多专家提到，希望借助河套的平台加强和国际间的合作，初衷很好，但是河套涉及到很多国际因素影响，未来需要我们研究者去评估里面的风险，及如何应对风险，这也是关乎未来河套能否发挥作用的很重要的地方。

最后，河套方案发布之后，我们已经开始研究深港建立深圳园区理事会机制的问题。未来深港如何协同，如何建立更深层次、更实质性的合作机制，从而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成为世界级的科研枢纽，也是未来河套合作区发展很重要的事项。

马洪基金会创会理事长 李罗力——

## 深港在河套地区合作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今天这个研讨会开得非常好，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几乎不参加这类活动了，但前些天刘炜秘书长邀请我参加张克科同志的新书发布会，我说一定参加。克科是我的老朋友了，而且我们一直是在深港研究方向上的合作伙伴，所以今天义不容辞地前来捧场。今天的研讨会对我本人而言也有很大的收获和提高，接下来我先对前面各位嘉宾的发言的若干亮点进行总结，最后再谈谈自己的想法。

首先对张克科同志《河套的前世今生与深港合作——深港科技创新口述史》一书的出版要表示热烈的祝贺。在河套开发研究领域，深圳方面的克科和香港方面的文伙泰先生两个人都是开创者。在河套开发漫长的历程中，克科始终如一，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研究深圳的一河两岸发展问题，既关注河套，又不局限于河套。刚才他的学生也提到，在深圳的高新科技产业培育方面，张克

科老师也做出了令人难忘的贡献，因此我们很高兴能看到克科这本著作得以出版。我前不久从深港科技创新的话题出发，也写了一本《深港合作共建高科技产业基地》一书（此书尚未出版），我在其中很多章节都引用了克科文章的观点。

今天会上大家从主题出发进行了轮番发言，我在台下听完感觉获益良多，尤其有一个亮点让我印象深刻。汪云兴讲“河套不是深圳的河套，不是福田的河套，也不是香港的河套，而是全国的河套，是全球的河套”。我认为这句话有如高屋建瓴，从高远恢弘的角度看待我们对于河套问题的定位、研究、眼光和境界，可以作为本次研讨会的标志性定位。

刘鲁鱼刚才指出，尽管国家发布了河套规划，提供了一系列政策支持，但实际上我们对河套下一步的发展仍是困难重重。我个人很同意他的观点。因为我们经年累月在研究香港问题和深港合作问题，与香港的很多人士打交道，涵盖了香港的政府官员、商界人士以及各界学者，切身感受到推动香港发展和推动深港合作实际上是很难的。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困难不在我们这边，我们这边始终是热情积极的，正如我在很多场合和文章中一直讲，我们深港合作（包括前海以及现在的河套在内），都是深圳这边“剃头挑子一头热”。这种情况在2021年迎来了转折点，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立法会发表2021年施政报告时提出了“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它象征着香港政府的转变，是一个历史性的拐点。但是这转变是否已经深入贯彻到香港政府各个机构，甚至扩散到它的商界、产业界以及市民群众当中呢？这一点还有待观察，在我看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虽然我们要努力去推动河套发展，但是也要充分的重视其中的困难。刘鲁鱼也阐述了他的设想，河套地区要避免房地产色彩过于浓厚，要以金融、法律为主要发展方向，要以开曼群岛为典范，将其打造成融资、避税、信息交流的中心。

张正峰提出的两个意见也很重要，一是争取全国人大给河套立法，把河套纳入到全国立法的考虑视角，我觉得这一点势在必行；二是要通过实施河套规划打开深圳的国际合作局面，促进深圳与全球主要城市进行交流，把深圳打造

成国际城市。当然设立目标是一回事，怎么实现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有这样一个构想，对于河套地区未来的发展来说还是很有启发的。

另外张克科提出了打造“河套湾区驿站”的展望与设想。他发言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什么是“驿站”，如何理解这一概念。听了他刚才在圆桌论坛上的讲话我理解了，“河套湾区驿站”的核心理念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深港双方在河套共同搭建平台，深圳的企业、金融机构可以到香港科技园或者河套地区去发展，但不一定要在香港注册；香港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也可以不需要注册到深圳这边来，只要有利于双方发展的要素都可以很方便地到对方这边设立工作点、研究点、合作点，以此促进双方的发展要素能够高度融合。我认为，我们需要去认真考虑“驿站”这一做法，这也是将来可以认真研究的方向之一。“湾区驿站”是克科提出的新概念，我听完之后也是大受启发。

刚才袁义才讲到，今天的讨论的观点和内容已经超过了国务院发布的《河套规划》，这一点我赞同。对于国务院公布的《河套规划》我们不能墨守成规，不能想着全盘照搬《规划》中的条件、政策、目标，不能凡事都去按照《规划》做。为什么说今天大家的讨论超过了《规划》？因为在场各位包括我自己都认为《河套规划》只是个大纲，河套发展要研究的问题很多，实现《规划》的过程中真正要再装进去的东西也会很多。将来如何把这个《规划》在行动大纲的基础上真正丰富它的内容，需要我们不断地创新。甚至很多时候需要我们因地制宜，从深港的现实出发灵活变通地实施。香港毕竟是特殊的，它是实行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如何突破其中政治因素、体制因素以及其他各方面因素的桎梏，在河套地区做出创新性的更加丰富的成果来，需要我们在《规划》之外更多的发挥主观能动性，因此袁义才的观点我深以为然。

另外袁义才也讲了三个亮点，一是河套发展面临新的机遇期，这个新的机遇期对我们而言有好有坏，有良好的形势也有严峻的形势（谢来风也提到了，要对《河套规划》面临的风险进行评估）；二是规划明确了河套肩负的国家使命；三是认为《规划》几乎已经包括了在此之前人们期望的全部政策。可能有很多人对于《河套规划》有不同的见解，在我看来，这个《规划》最重要的意

义在于，把多年来一直是深港两地在讨论河套发展问题，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

刚才谢来风谈及《河套规划》的研究历程。因为我很长时间没有参与研究院的研究工作，所以我也第一次听说从2017年国家就开始布局研究制订《河套规划》。现在国务院公布的《河套规划》，是由国研中心牵头，包括我们研究院以及深圳发改委、决咨委在内都参与其中，多方合力研究、设计了很多版本。说明我们的《河套规划》在上升到国家战略的过程中，经过了非常细致认真的研究。

另外我很赞同谢来风提出的观点：《河套规划》很重要的特点是“协同发展”，或者说《规划》的核心就是协同发展。河套方案如何实现我们与香港的协同发展，这也是我们理解国务院《河套规划》的重要结点。河套发展现在面对的国际形势非常严峻，尤其是来自美国的打压，香港如今也已经变成被打美国压的对象了，甚至香港特首要参加国际会议都被美国拒之门外，只是目前香港还没有被列入到美国的制裁名单而已。事实上我们国家现在重要的战略产业（主要是高科技产业、金融产业等），美国都在拼命制裁打压。所以，未来《河套规划》实施过程中，我们都需要充分考虑和研究国际环境对香港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以及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等等。对于河套怎么发展、深圳怎么发展、香港怎么发展，不能抱有一厢情愿的想法，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研究，需要解决。刚才我还注意到谢来风提到深港两地建立园区理事会机制的问题，理事会如何运作还有很多实际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以上是我对各位嘉宾发言内容的几点归纳总结，算是帮助与会者捋清思路，发现并整理出亮点，对各位而言也是一种收获和提高。

接下来我简要地讲一点个人想法。我一直在申明一个观点，深港合作与全国各省市和香港之间的合作，包括穗港合作、沪港合作、京港合作都不同，最重要的不同就在于，深港之间是“同城合作”。深圳和香港两地仅一水之隔，两者实际上是一个城市群。深港的合作实则是“一体化”合作，是一种两地经

济和社会的“融合”发展。虽然现在讲深港合作“同城化”、“一体化”、“融合发展”，在书籍出版或者公开发表文章的时候都受到限制，但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换言之，只有深港的合作是“融合”的，是“同城”的，是“一体化”的，这是深港合作区别于其他城市和香港合作最大的特点。

第二，河套地区合作，就是深港“同城化”发展最早的一个，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节点。现在无论在深圳还是香港哪里还有同城化的运作？哪个地方都没有！只有在河套地区，在福田保税区和深圳河对岸，深港双方签订了协议，将这片地区建设成了“同城化”的实验区，这一点非常重要。从二三十年前开始，文伙泰先生、张克科先生，也包括我们研究院在内的刘鲁鱼、谭刚等人就开始研究深港合作了。我是1993年底调到研究院来工作的，而他们在1992、1993年就开始参与这项工作。我们现在福田口岸的穿梭巴士就是刘鲁鱼他们提出研究报告最终落实的重要成果，而能在当时落实这个项目就是很了不起成果了。这些年来进行河套地区深港合作各方面的人都没有停止过努力，但是实际上河套地区的研究中间还是停滞了很长时间。这次《河套规划》的公布为我们开辟了新的前景，创造了新的空间，提出了新的命题，大家可以用很多的新颖的构想和研究方向去丰富它。

刚才我提到，当下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有利的条件，就是上一届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提出的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的提出象征着港府第一次承认深港合作，第一次承认深圳是和香港处于在同等高度的合作伙伴。过去我们研究深港合作的朋友都知道，香港不认同深圳，他们认同的是粤港合作，在他们看来香港是和广东省平起平坐的，深圳和香港合作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所以他们原先对于深港合作并不积极。但是从北部都会区开始，他们认识到香港的再工业化也好，新型工业化或者是各种振兴也好，都离不开深圳，而且现在形式已经逆转，深圳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超过了香港。以前都是深圳人南下，如今是港人北上，现在的深圳已经成了港人的主要消费圈。所以我觉得研究河套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香港北部都会区的背景，我们不能够仅仅着眼于河套这几平方公里的地区，要将北部都会区这个香港的大计划纳入视野。我们河

套将来发挥作用，不说在全球、全国的范围内，就是从深港两地出发，我们都不能够把目光局限在河套这几平方公里。

我在自己的书中提出了另外一个想法，虽然张克科可能不太同意我的观点，但是我一直坚持这个主张，为此也写了很多文章，那就是深港合作一定要实现真正的高科技产业合作。我现在非常担心现在河套的地区产业发展，尤其是“研发中心”和“中试试验区”的问题。我想向在场各位提出几个问题：深圳现在有不少国家高端实验室，它们有没有可能建设到河套去？没有可能！深圳大学、南科大等等深圳高校的科技研发中心有没有可能建设到河套去？没有可能！深圳的高科技发展主力军是企业研发，但是深圳的高科技企业如华为、中兴、比亚迪等等，有没有可能把它们的研发中心建设到河套去？没有可能！它怎么进行中试？和谁进行中试？中试是和产业配套的，产品从实验室出来后需要完成中试才能和产业配套，然后才能形成产业链。河套地区产业链如何培育？供应链在哪儿？上下游产业怎么办？现在能去的只有港科大、港大、香港理工大学等等，仅此而已。河套地区4、5个平方公里，仅仅几个研发中心怎么填满？河套里面剩余的面积要摆什么？

我很担心河套的发展会重蹈覆辙，成为又一个前海。《前海规划》很高大上，同样也是国家战略，但实际做出来什么了？就是个“曼哈顿”罢了，没有实际意义。真正的《前海规划》有多少落到实处的？大部分只是一时深圳“剃头挑子一头热”的设想。《前海规划》对香港经济发展起到什么作用了？没看到！到头来还是我们自己玩自己的。我们现在一定要考虑在《河套规划》里面能够玩出来什么东西？能否把产业放进去？没有产业进入，没有企业进入，没有上下游配套产业进入，你光摆几个研发中心有什么用？更何况香港没有什么研发中心，除了几个大学之外，它根本没有高端产业。大部分港资企业现在仍然属于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香港的金融业、物流业、航运业等等都只是为实体经济配套的服务业而已。香港经济的要害实际上是“产业空洞化”。香港提出“再工业化”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吧，现在有什么真正的进展？香港建设高科技园也已多年，它的高科技园如今也没有什么大的进展，在我要新出的书里

对此都有认真的研究，提出各种数字资料的佐证。

现在香港在河套那边建设了一个科技园，总共就是寥寥几所大学摆的研究机构，还不如我们这边热闹。我们福田区在河套这边的福田保税区建设了很多机构，但都也是研发中心、实验室、测试室等。福田区拿出来这些东西，能代表我们深圳的高科技产业吗？我们真正的高科技产业在哪儿？在南山区，在高科技园！当然全市现在也都很多高科技产业，但问题是怎么将它们引到河套地区去？河套地区在这个过程中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提出的这些都是很实在的问题，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才是真正有实际意义的。

当然我不是给大家的热情泼冷水，我是觉得在研究河套发展问题时，我们能否在国家规划基础上，想办法用一些新的方式、新的内容把它填实了，变成实实在在的发展规划和发展前景。前海也有规划，也是国家战略，当时公布时同样很让人震撼，然而实际的发展成果却差强人意。前海的问题我言至于此，不再多说。

谢谢大家，嘉宾们的精彩发言还是给了我们很多启发，感谢今天所有参加会议的同志们！

《马洪基金会专刊》是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编印的内部参阅资料。

- ◇ 读者群为基金会上级领导部门、理事和名誉理事、智库百人会专家学者及其他机构、企业的高层管理者。
- ◇ 主要内容为重大研讨活动、论坛、沙龙等学术交流中富有价值和启发性的综述文稿及学者文章。
- ◇ 稿件来源以马洪基金会及智库百人会的专家智者为主，同时也广泛欢迎社会各界专家学者积极参与。

地 址：深圳市罗湖区银湖路金湖一街 CDI 大厦 4 楼      邮 编：518029

联系人：黄伟卿      责任编辑：吴泽婷

电 话：0755-82470728      电 话：0755-82470650

网 址：<http://www.szmhf.com>      微信公众号：szmhf01

